

穗港飲食雙城記



文化什錦
方曉嵐

清朝時候，山西商幫曾雄霸大江南北，人稱晉商，列為史話，其實在廣東省，也有一派影響歷史的商幫，他們都是佛山和順德人，對「食在廣州」和「美食天堂」的香港的飲食影響尤其深遠。

明永樂年間，廣州開放為對外通商，當時廣州的飲食娛樂，都集中在西關一帶，更向西輻射至佛山地區。當時的佛山，佔着西江水利之便，成為水路交匯的樞紐，商務繁榮，佛山與漢口鎮、朱仙鎮、景德鎮並列為當時中國的「四大名鎮」。

明清時期，廣州人甚好喝茶，這與悠久的南方絲綢之路茶葉貿易有關，而且喜歡「嘆」靚茶，對普洱茶的貯存尤其講究。清咸豐年間，廣州的茶居多為舊式磚木建築，皆由餅館店發展起來，嘆盅茶食伴餅，稱為「茶居」、「茶寮」。

清末乾隆二十二年，廣州再次成為唯一的通商口岸，至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有八十多年的繁盛時期。到了光緒年間，佛山商人的資本大量湧入廣州，建了一批三層高的商業樓，開辦名副其實飲茶吃點

心的「茶樓」。茶樓是指開設在有三四層的建築物內，全幢由同一家字號經營的粵式食肆。民國時期，隨着人們的生活習慣逐漸改變，迎來了茶樓酒樓的百年黃金歲月，而當時廣州的大多數茶樓酒樓以至於後來的酒家，包括民國時期的廣州四大酒家，背後都有佛山商人的身影。

香港飲食行業深受廣州的影響，基本上與廣州同步發展。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香港的民間飲食，以茶寮、茶居等經營為主。茶寮多建於山邊木屋區，只做早茶和午市，做的是附近居民的生意，擺放幾張枱檯，廚房設備簡陋，茶葉是粗茶，但因採山澗水沖茶，茶水入口清甜而受歡迎；茶居分為高檔和低檔次兩類，高檔的茶居設在市區樓的二樓，樓底高而樓面寬敞，設茶水櫃擺放茶葉，任由客人自動選茶和沖水，或由熟客自備靚茶葉，點心由男工叫賣；低檔次的茶居，又稱地痞茶居，茶水全自助，點心亦可自取，吃完按籠計算。茶居形式一直到六七十年代仍存在，例如大坑東木屋區、雞寮木屋區、茶果嶺，以及多區的臨時徙置區。

廣州飲食界的佛山商幫，在一八四〇年代南下在香港投資茶樓，對港穗的飲食文化發展，居功至偉。大批原籍順德的廣州粵菜廚師，隨着佛山幫的廣州酒樓字號移居香港，為香港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粵菜廚師，而直至八十年代，香港很多粵菜名廚都是原籍順德，或者是曾經師從南下的順德名廚。一八四六年廣州商人在上環投資香港第一家茶樓「杏花樓」，此後廣佛商人紛紛來港投資茶樓。設有樓高幾層而有獨立門牌的粵菜食肆，跟隨廣州的風俗，不稱茶樓而稱「××樓」，以示高級和店舖規模大，例如杏花樓、宴瓊林、聚馨樓、探花樓、三元樓、觀海樓、第一樓等等。一九一〇年西環金陵酒家開業，老闆馮儉是風雅之士，每兩個月便在香港舉行畫展，因古詩「夜泊秦淮近酒家」，故取名為「金陵酒家」，從此業界紛紛仿效，從此，香港出現了很多家稱為「酒家」的粵菜食肆。

其實一九一〇年代的茶居、茶樓與酒家，經營方式是不同的，茶樓的早市是由早上六時至十時，下午三時至五時為晏市，不

做晚市；而酒家是中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做午市，傍晚六時至九時為晚市。兩個行業分屬各自工會，本來相安無事，直至廣州陶陶居引入酒家的全日經營範圍，引發了一場茶居工會與酒家工會的械鬥事件。事件平息之後，各方同意，「茶樓」、「酒家」各取一字，稱為「酒樓」，有茶市點心，也有賣燒臘，同時主打飯市和筵席，由朝做到晚。

一九二〇年代的粵式點心分成茶樓、茶居、酒家兼營茶點。茶樓與茶室、茶居的最大分別，除供應的茶講究外，熱點的供應，既沒「回籠」也不賣「翻蒸」的點心，茶樓一日三市，早茶由清晨五時至早上十時，午茶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晚茶晚上七時至十一時，稱為「三茶兩飯」。茶居茶室營業時間是每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四時，四時以後兼營酒菜。酒家如果是兼營茶點的話，每日由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四時，四時以後則經營酒菜至凌晨二時。

近大半个世紀，香港基本上已不再細分為茶樓、酒家、酒樓，雖然名稱有別，但同樣是綜合性的模式，營業時間各自制定。

金庸與藝術



善治若水
胡恩威

為紀念金庸百年誕辰，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任哲雕塑展」。該展覽透過二十二位金庸筆下小說人物的雕塑，讓觀眾認識和懷緬金庸這位文壇巨匠。

金庸的小說有很多藝術成分，中國古詩詞是核心之一，也有一些是與中國傳統戲曲有關。文學作品可以天馬行空，包羅萬有，可以談飲食，談藝術、談歷史，讀者都可透過小說體會藝術和生活的各種呈現。

金庸作品另一藝術特色是插圖。金庸和不同的插畫高手合作，包括姜雲行、王司馬和董培新等。王司馬在《笑傲江湖》中創作的插畫可謂經典，他那種放蕩不羈的水墨筆法，完全配合《笑傲江湖》的題材本質。姜雲行為《神鵰俠侶》畫插圖，着重人物表情及情緒表達。董培新對金庸十五部小說的理解及想像，將部分情節化成水墨佳作。本地漫畫家李志清將《射鵰英雄傳》改編成漫畫版也是經典。二〇一八年香港郵政特別發行一套由李志清設計的「金庸小說人物」

紀念郵票。金庸的影響力之大，對華人世界具有強大的滲透力，他的作品貼地，也別富藝術性和啟發性，不僅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等流行文化，也可變成雕塑和繪畫藝術。

正值金庸誕辰一百周年，一系列紀念活動陸續登場，金庸小說人物雕塑展是一個開始。金庸這位文壇巨匠，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從生平、文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角度去分析和理解他對華人社會的影響。金庸小說中的插畫、水墨等多種繪畫風格，乃至書法等，都是視覺藝術的瑰寶。若果未來要舉辦金庸藝術展，還可以邀請不同年代的藝術家，透過金庸作品啟發創作，向金庸致敬。例如舉辦「金庸書法藝術展」，由書法家把金庸小說的金句變成書法藝術，想必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展覽主題。

舉辦金庸紀念活動的目的，除了紀念金庸之外，也是透過他的作品促進藝術文化發展。金庸被稱為「俠之大者」的原因，筆者相信還在於他影響力之深遠，能夠積極推動藝術發展，尤其是弘揚中華文化對世界的影響。



英倫漫話
江恆

「求您了先生，請再給我一點粥」，這是英國大文豪狄更斯《霧都孤兒》(Oliver Twist)中主人公奧利弗的經典對白，作為維多利亞貧民院的孤兒，他終日飢腸轆轆，只想多要點兒食物填飽肚子，在小說之外，有關奧利弗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擔任《本特萊雜誌》主編的狄更斯，開始在雜誌上以每月連載形式刊出《霧都孤兒》，雖然小說尚未一次成型，但他對內容構思已久，甚至可說是深思熟慮，正如他在初版序言中所說，這是一本描寫盜賊的小說，「我多次讀到關於竊賊的描寫，但從來沒有看到悲慘的現實描寫。我覺得如按他們的本來面目來揭露他們的一切醜惡與乖戾，這該是對社會的極大貢獻。」他口中的盜賊，就是那些打着救濟的旗號欺壓社會底層的剝削者。

狄更斯之所以選擇從孤兒入手，很大程度緣於他不幸的童年。在他十歲時，其父為躲避債務，舉家從港口城市樸茨茅斯移居倫敦，兩年後終因無法償清債務而全家被關進監獄，出獄後狄更斯去黑鞋油工廠當了童工，靠貼標籤以補家用，那些充斥飢餓、欺辱的日子，給他留下終生烙印。與此同時，他漫步於倫敦街頭時，目睹了無數黑暗面，就像他後來致友人的信中所說，「一場倫敦式的、貧民窟後巷式的散步，就像騎士探尋冒險那樣。」這些痛苦經歷，讓狄更斯對底層生活有了切身體驗，他要全部寫進小說。

他很快找到創作靈感，一個就是距離他住所不到一百米的克里夫蘭街救濟院 (Cleveland Street Workhouse)，那裏專門收容殘障、病患等貧民。據大英圖書館史料考證，狄更斯在《霧都孤兒》中呈現的情節，與該濟貧院的實際情況頗為類似，小說中奧利弗的帽子是用棕色布料做的，而該濟貧院男童的制服也是如此，小說中所提到的各項制度也和該濟貧院相差無幾，很多準確的細節表明，他在寫故事之前曾做過大量調查。

和現實中克里夫蘭街救濟院聲名

護佑者



▲狄更斯小說《霧都孤兒》屢被搬上舞台。

圖片來源：Alastair Muir

狼藉一樣，在狄更斯筆下，管理濟貧院的也是一些自以為是、冷酷無情的人，他們對待救濟對象十分苛刻。以伙食為例，院方規定每天以麥片粥為早餐，每周只有三天提供一定分量的麵包。接下來每天只以湯為正餐，而湯則是用前一日煮肉留下來的肉湯做的。周六既沒有肉，也沒湯，只有一小份乳酪。也難怪小說中瘦骨嶙峋的奧利弗會大聲哀求：「請多給我一點吧」。由於衛生條件極差，濟貧院臭氣熏天，就連實地考察的新聞記者都忍不住將這種氣味稱作「惡臭之氣」。

一八四五年在漢普郡安多弗鎮的救濟院曾發生著名醜聞，該院不僅剝扣救濟者的食物，還強令院中貧民超負荷工作，完不成者就會被扣除本就不多的食物或是會被鞭打，導致院內人們啃食骨頭上的腐肉成為常見現象。醜聞曝光後，引起英國輿論嘩然，但最終不了了之。狄更斯在《霧都孤兒》中感慨，貧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在濟貧院裏慢慢餓死，要麼在濟貧院外快快餓死」。

整個十九世紀克里夫蘭街救濟院都一直保持運作，直至二十世紀初才轉成醫院。二〇一七年，該舊址計劃改造成豪華公寓，但遭到文學界的強烈反對，當中包括狄更斯第五孫女的作家霍克斯利。他們認為這座救濟院是倫敦社會和文學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揭露倫敦底層社會的生存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個則是與狄更斯住所一街之隔的育嬰堂 (The Foundling

Hospital)，其創建的初衷是慈善恤孤，就連起名字都充滿人文關懷，創辦人沒有採用 orphan (孤兒) 或 abandoned children (棄童) 這樣常用詞，而是使用較冷門的 foundling，就是考慮讀音聽起來更像 fondling (可愛)，避免予人悽慘的印象。當時狄更斯常常拜訪育嬰堂，並和家人一道在那裏的教堂做禮拜。或許他對育嬰堂甚有好感，他把一位工作了半個多世紀的秘書寫入《霧都孤兒》，成了滿懷慈善之心、常常幫助奧利弗的布羅羅先生的原型。至少在狄更斯眼中，其與濟貧院有着本質區別。

值得一提的是，育嬰堂的營運方式正是當代流行的藝術+音樂+慈善之雛形。比如，被貝多芬稱為史上最偉大作曲家的喬治亨德爾，其曠世之作《哈利路亞大合唱》便是首次在育嬰堂的教堂演奏後名聲大噪，他在遺囑中特別吩咐要將清唱劇《彌賽亞》的一份總譜和全套分譜都留給育嬰堂。被人稱作「英國繪畫之父」的賀加斯，開創性地在育嬰堂建立了開放給公眾的圖畫館畫廊，並收取門票為育嬰堂籌款，從而拉開英國藝術支持慈善的歷史。如今育嬰堂原址已被改造成為倫敦博物館中獨樹一幟的育嬰堂博物館 (The Foundling Museum)，是不少遊客喜歡參觀的地點之一。

狄更斯一向以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著稱，在他西敏寺的墓碑上這樣寫道：他是貧窮、受苦與被壓迫人民的同情者，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英國作家。很多英國人認為，碑文上應該再加上一句：兒童的護佑者。

▲韓經arte愛樂樂團 © Jyeon Sim



韓經愛樂的香港首秀



黛西札記
李夢

去年十一月，隨香港藝術節傳媒團前往首爾，觀看韓經arte愛樂樂團與當紅指揮家吳懷世排練葉小綱新作《消失的銀杏》，並欣賞鋼琴家孫受秀在樂天音樂廳的全拉赫曼尼諾夫鋼琴獨奏會，印象甚深；短短三個月後，終於等到這個韓國年輕古典樂團的香港首秀。

樂團此番應邀參與香港藝術節，帶來兩場音樂會，一場是專為大小朋友舉辦的親子音樂會，另一場在上周二晚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樂團與指揮家吳懷世及鋼琴家孫受秀合作，上半場是柴可夫斯基第六交響曲「悲愴」，下半場是拉赫曼尼諾夫第三鋼琴協奏曲。兩部作品都炫技且力量澎湃，加之葉小綱《消失的銀杏》開篇，是次香港首演可謂誠意滿滿。這個平均年齡三十多歲的年輕樂團，成立八年以來，積極外出巡演，不遺餘力在國際舞台展示韓國古典音樂的豐沛活力。

大家如留意近些年國際音樂比賽的得獎名單，不難發現韓國年輕一代常常榜上有名，由他們詮釋的俄羅斯

或德奧古典名曲，論技巧、論抒情，都不遜歐美選手。今次隨樂團來港演出的鋼琴家孫受秀，便是范·克萊本國際鋼琴大賽史上最年輕金獎得主任燦棟的老師。近年韓國音樂人才輩出，與該國經濟發展不無關係，更重要的是家長對於音樂教育的關注，以及民眾對於古典音樂的尊重與熱愛。

就我們去年冬天在首爾樂天音樂廳現場所見，一場選曲相當大眾的、本地藝術家舉辦的獨奏會，竟能達到近乎滿座的入場率，而音樂會後更有眾多觀眾（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年輕人）等候在音樂廳外，希望與鋼琴家見面交流。這在香港，是較少見到的場景。對於本地的音樂家和樂團，是否給予足夠的支持與幫助，實在值得深思。

其實不只香港，全世界很多城市的古典音樂青年人才，都存在機會和平台不足的問題。即便在古典音樂市場已頗成熟的韓國，也同樣面臨僧多粥少的尷尬。

韓經arte愛樂樂團此次來港首秀並備受好評，或值得業界參考及借鑒：如何將更多的香港優秀藝術家和藝團，帶往海外城市演出並收穫關注及掌聲？



「戶外迷宮」



市井萬象

法國藝術家 Camille Walala 「Planet Walala@海港城」彩色公共藝術企劃正在舉行，帶來三大項目包括兩個大型藝術裝置以及個人藝術展，其中在海運觀點展出常設裝置「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以及戶外迷宮藝術裝置「A-MAZE」。

香港中通社